

冰点特稿第930期

家有四胞胎

本报记者 张莹



童年时的四胞胎

张克非摄

降生记

1995年,怀孕3个月的孙艳梅担心自己怀了个怪胎。

“长得太快了,两三个月就能摸着,我寻思什么玩意?”曾经失去过一个婴儿,这个第二次怀孕的农村妇女有点儿担心。

5个月的时候,夫妇俩跑去海林市的医院检查,检查的结果是三胞胎。丈夫王华军觉得还是去牡丹江检查一下比较“稳妥”。孙艳梅怀孕6个月的时候,俩人揣着全部存款一千多块钱,去了牡丹江妇幼保健院(当地人习惯称之为“妇产医院”)。

对着仪器的屏幕,B超室的医生禁不住惊喜地叫了出来:两男两女,是4个!我看到4个小脑袋!

突如其来消息让王华军有点儿懵,孙艳梅则焦急地追问:4个脑袋不是长在一起的吧?

医生告诉这对20多岁的农村夫妻,四胞胎的成活率低,必须立即住院,否则十分危险。

王华军有点儿纠结,一方面,他们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婴,这次说什么也得把孩子保住。另一方面,夫妻俩只有4亩口粮田,主要收入靠他冬天去林场打零工,先不说住院得花不少钱,就说这4个孩子,生下来咋养?

“能保俩就行……”对没出世的孩子,王华军当时还没法体会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。

“要保就得全保,否则一个也保不住!”被医生严重地警告后,这个头发特别乌黑浓密的年轻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办理住院手续。

安顿好妻子,王华军抽空回了趟家。收拾住院生活用品的时候,他告诉家里人,她如怀的是四胞胎,跟孩子妈的反应一样,奶奶也担心:正常吗?能活吗?孩子的姥姥和三姨姥姥赶紧赶工,给4个孩子做小棉袄、小棉裤。

就在这一家子忙着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时,另一些人忙了起来。

检查出四胞胎的当天晚上,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接到了妇产医院院长袁丽华的电话。这位情绪兴奋的老朋友开门见山地向她宣布: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!你来采访一下?

医学界有关调查资料推算显示,正常情况下,双胞胎的出现几率是1/89,三胞胎约1/7900,四胞胎大约要出活70.5万人中才会有一例。四胞胎本身就罕见,即便有,也多为“四小龙”或“四小凤”,而龙凤四胞胎在当时并没有记载。

“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将迎来全国首例龙凤四胞胎”是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儿,这个记者火速通知了市面和省里的媒体,紧锣密鼓地筹划起这场地市面媒体、广播、电视联合报道的“全媒体”行动。

1996年1月30日,即将临盆的孙艳梅在镜头的簇拥下艰难地翻上了手术床。

住院期间,妇产医院想尽办法地帮她医保,不仅每日免费供应营养餐,还不时地给她买各种水果。医院拿她小心翼翼,洗澡的时候不让她搓肚子,怕把孩子“搓掉了”。

或许再找不到第二个产妇能受到与她相同的“待遇”:手术室里,除了医护人员,外围还站着圈一圈身穿白大褂,或举照相机或扛摄像机的记者,严阵以待。

躺在手术台上,孙艳梅除了紧张,唯一的感觉就是手术床太窄了,有点放不下她的大肚子。怀孕期间,她的体重增加了近70斤,走在医院里,不明就里的人都笑她“肚子大得不像样”。

手术室外的王华军也挺窘,他没想到生孩子这件事儿也能吸引记者。面对着乌央央一大群记者,这个不太爱说话的农村青年有点儿手足无措,等待孩子的紧张和应对媒体的生涩,让他说话直打磕巴。

上午9时12分开始,4个孩子被陆续取出。老大6斤4两,老二6斤,老三5斤6两,最小的老四是4斤8两。

护士们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抱出来,走廊旋即变得喧哗。王华军把每个孩子都细细端详了一番,白颜色襁褓里的4个孩子粉嘟嘟的小脸儿,让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,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同一句话:高兴,确实高兴。

人群中有人适时插话:快跟医生说说

句。话简随即伸过来。王华军赶忙转身,握着院长的双手说:“感谢感谢,这4个孩子的生命是你们医院给的,要是在家,绝对那个什么……”

手忙脚乱的日子

从牡丹江城回到新农村,夫妻俩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,很快便被乱糟糟的房间和洗不完的尿布搅得七零八落。

王华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里,因为要洗大量的衣服和尿布,他们家用掉了整整9箱肥皂,家里那台老式波轮洗衣机的甩干桶也给甩坏了。

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,除了母乳,4个孩子每天吃半袋奶粉足够;十几天后,奶粉的消耗速度变成了一天一袋;不到3个月,孩子们吃光了80袋奶粉。

加上这期间购买和用坏的30多个奶瓶,50多个奶嘴,家里的花销一下子大得惊人。省内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主动提出,供应四胞胎的奶粉直到其成年。

奶粉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。但生完孩子之后,家里的劳动力只剩王华军一个人,且自打孙艳梅怀孕,他冬天再也没办法离开家,独自去林场打工。

最怕的是孩子生病。同样的病,4个孩子每每得轮流生一次。第一年年底,单在村诊所的结账,就有3000多元,相当于夫妻俩当时一年的收入。王华军只得开始生平第一次偿债,对象是在日本打工的妹妹。

回家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,农家的房间里,除了炕头是热的,头顶上的空气都透着冰冷。4个娃娃被冻得哇哇直哭。王华军只好用两床棉被把他们严实地把裹起来。

担心来回起身掀被子冻着了孩子,王华军当父亲的第一年是打地铺度过的。不过,他真实睡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,4个孩子不停地哭、尿,按住了葫芦浮起瓢,让夫妻俩不得安生。

用他的话说,媒体来了,可能就为了拍张照片,完成任务就走。但他们还要继续在村子里,关于他们一家的闲话已经太多了。

孩子刚生下那会儿,关于社会各界关注四胞胎一家的新闻铺天盖地,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收到了捐款。有人猜测:王华军一定借孩子发了笔大财。

“妇产医院扣除了医药费,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。这不是嘛!”王华军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,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捐款的时间、单位和金额。

“有些事你没法辩解,你说了人家也不信。唉!”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,王华军佝偻着身子,蜷起一条腿贴在胸前,用双手抱住,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。

最让这个男人窝火的是,哈尔滨有一个给孙艳梅开过药的中医,在四胞胎出生后打出广告,贴出他和孙艳梅的照片,说他们夫妇结婚多年不孕不育,是吃了她的中药后,才一孕生下四胞胎。

“我媳妇之前那个孩子没活,为了调养身体才找她抓的中药。”王华军气恼地说,当时小广告发得到处都是,结果媒体都听那位中医的,追到村里来采访,两口子又无意间惹上了收钱的谣言。

“那你咋不告诉她?”“告啥啊,她也是为了药好卖,再说咱确实是在人家那看过病。”王华军搓了搓胳膊,无奈地说。

相比王华军的隐忍,性格直爽的孙艳梅,有时 would 忍不住开腔辩几句。

报户口的的时候,妇联的人问她:你这是一胎养的么?不是一胎养的说啥也不能给你报。

“可不是一胎,不然谁也不能要这些玩意,我现在也不能掐死。”孙艳梅气得够呛。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。孙艳梅从生产完落下高血钾的毛病,天一热不能下地干活儿,有人脚掬她:钱多得连活儿都不干了。王华军为了多承包几亩地,借钱买了辆拖拉机,又有人议论:吃低保还有钱买车?

那会儿一有毛病就送妇产医院,我也不管就回来了。那个时候的医院办公室主任挺好的。俺们家老大还抽过他的血呢!”王华军说,“好像说是给小孩输血,病好得快”。

说起妇产医院当年的照顾,王华军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了感激。孙艳梅住院期间,夫妇俩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,剩余的住院费和手术费,医院考虑到了他们的情况都

没有收。四胞胎回家后,妇产医院还派医生给孩子们做了次免费体检,赠送了一些儿童用品和玩具。

为了表达感激,孩子刚出生的时候,王华军就把给孩子起名的权利交给了医院。最终,在一个媒体人的提议下,按“妇产医院”的谐音,4个孩子按长幼,依次取名为王富、王毅、王婵、王苑。

老大老二为男孩,老三老四是女孩。因为是异卵多胎,4个孩子长得各不相同,性格也挺不一样。

“老大最淘,小时候喜欢趟水、摸鱼。老二性格最像我,他脑瓜好使。老三小时候最爱哭,哭起来小脸儿黑红黑红的。老四最有主意,能揣拨事儿,那几个都听她的。”黑瘦的王华军总结道。

孩子会跑会跳以后,孙艳梅开始到地里帮王华军干活,4个孩子常常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,把家里看门的黄狗抱到炕上玩耍,然后给她留下满炕的屎尿,和4套脏衣服。

夫妇俩对孩子有点儿娇惯,上初中之前,孩子们很少自己洗衣服。初中住校后,每个月回家的时候,孩子们都会背回来些“大件儿”给孙艳梅。王毅还曾经闹过“一条床单在水房泡一个月”的笑话,“发现的时候都泡臭了”。

零用钱不够的时候,老二老四常常帮老五打出手抱住,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。

被围观的生活

“我不愿接受媒体(采访),我也不会说。真是,咱有啥的啊,就是种地的。有些人就不,老觉得俺家4个孩子怎么怎么的,想太多了。”王华军说。

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,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,变成了现今的反感。

高一军训的时候,电视台又来拍他们。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,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。

高考之前,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,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,刚一到学校,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。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,让他讲两句。

事实上,这些年来,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”,持续关注这家人媒体已经寥寥无几。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,在消退的同时,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。

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粉制品直到18岁的那家企业,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。曾经对着镜头,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,在镜头之外,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。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,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。

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,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。人家抢白她:没有政策,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?

“咱就去问问,又不是管你要钱,这世上人拉扯一通!”

从那以后,孙艳梅和王华军打定主意:以后咱谁也不用,就凭咱自个儿,谁让咱自个儿养的。咱挣干的吃的干的,挣稀的吃稀的。

因为自己养了4个孩子,王华军从来跟别人比什么。只有一件事例外,就是孩子们的学校。

王华军上高中的时候,成绩不错,他参加过高考,只差5分没考上大学。他一直挺后悔,当时考上的高中同学,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错,“这个长,那个长的,出门开着小汽车,还有当律师的”。对比自己的境况,他后来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了。

四兄妹被海林林业局一中接收后,王华军担心农村孩子基础不行。他找木头钉了块小黑板,刷上黑漆,又在村大里装修房子固定的废物堆里,捡了一大盒彩色粉笔。

等孩子们放暑假回来,王华军自家的小课堂就开始了。

他蹲在地上讲,孩子们趴在炕上听。主要讲下个学期要学的数学,顺着带着辅导一些英语语法。讲完例题王华军还会出题给孩子们做,然后挨个检查。

“最怕他给俺们上课。”“做题做不出来就得挨打。”“俺们都希望赶紧到中午,好去我奶家吃饭。”孩子们腻牙咧嘴地回忆道。

“王富被打的次数最多。”老四王苑还不忘揭短。这个家庭小课堂持续了3年,孩子们上高中以后,王华军也辅导不了。

孩子们在“对付”老爸上很有默契。上小学时,只要考试没考好,王华军问起来,4个孩子永远口径一致,只说名次,不说分数。

“农村小孩学习都不咋好,名次肯定比分工儿好呀。”比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着说。

上了高中,家里只有王苑读文科,王华军在屋里的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,一张世界地图。

“我说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,你一闭上眼睛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就不在你的脑子里么?中国铁路走什么线,黄河经过哪几个省,不都在脑子里装着么?我现在都在脑子里,我说哪个省会不在脑子里么?”

“你们不行现在在这孩子不行,一点儿压力没有!”王华军无奈地摆了摆手。

在家看电视的时候,几个孩子喜欢看动画片。王华军夫妇在影视公司打工。为了孩子,王华军夫妇寻思试试。结果,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,就决定回东北老家。

王华军说,那位董事长是个好人,是真心想帮忙。但让4个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哪儿有那么容易,人家公司也不缺人,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。

“咱是农村人,享受不了那里。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。”他说,“农村家再破也是家。咱们自己慢慢整吧”。

这些事夫妇俩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起,他们不想给孩子们带来压力。

然而四胞胎的标签还是让孩子们感觉到负担。自打去海林林业局一中读书,换了新环境的4个孩子就把拒绝再穿同样的衣服。

“我上了大学,绝对不让人知道我是四胞胎。”性格耿直的王苑带着点儿情绪说道。

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,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,变成了现今的反感。

高一军训的时候,电视台又来拍他们。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,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。

高考之前,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,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,刚一到学校,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。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,让他讲两句。

事实上,这些年来,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”,持续关注这家人媒体已经寥寥无几。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,在消退的同时,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。

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粉制品直到18岁的那家企业,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。曾经对着镜头,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,在镜头之外,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。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,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。

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,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。人家抢白她:没有政策,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?

“咱就去问问,又不是管你要钱,这世上人拉扯一通!”

从那以后,孙艳梅和王华军打定主意:以后咱谁也不用,就凭咱自个儿,谁让咱自个儿养的。咱挣干的吃的干的,挣稀的吃稀的。

因为自己养了4个孩子,王华军从来跟别人比什么。只有一件事例外,就是孩子们的学校。

王华军上高中的时候,成绩不错,他参加过高考,只差5分没考上大学。他一直挺后悔,当时考上的高中同学,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错,“这个长,那个长的,出门开着小汽车,还有当律师的”。对比自己的境况,他后来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了。

四兄妹被海林林业局一中接收后,王华军担心农村孩子基础不行。他找木头钉了块小黑板,刷上黑漆,又在村大里装修房子固定的废物堆里,捡了一大盒彩色粉笔。

等孩子们放暑假回来,王华军自家的小课堂就开始了。

他蹲在地上讲,孩子们趴在炕上听。主要讲下个学期要学的数学,顺着带着辅导一些英语语法。讲完例题王华军还会出题给孩子们做,然后挨个检查。

“最怕他给俺们上课。”“做题做不出来就得挨打。”“俺们都希望赶紧到中午,好去我奶家吃饭。”孩子们腻牙咧嘴地回忆道。

“王富被打的次数最多。”老四王苑还不忘揭短。这个家庭小课堂持续了3年,孩子们上高中以后,王华军也辅导不了。

孩子们在“对付”老爸上很有默契。上小学时,只要考试没考好,王华军问起来,4个孩子永远口径一致,只说名次,不说分数。

“农村小孩学习都不咋好,名次肯定比分工儿好呀。”比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着说。

上了高中,家里只有王苑读文科,王华军在屋里的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,一张世界地图。

“我说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,你一闭上眼睛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就不在你的脑子里么?中国铁路走什么线,黄河经过哪几个省,不都在脑子里装着么?我现在都在脑子里,我说哪个省会不在脑子里么?”

“你们不行现在在这孩子不行,一点儿压力没有!”王华军无奈地摆了摆手。

在家看电视的时候,几个孩子喜欢看动画片。王华军夫妇在影视公司打工。为了孩子,王华军夫妇寻思试试。结果,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,就决定回东北老家。

王华军说,那位董事长是个好人,是真心想帮忙。但让4个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哪儿有那么容易,人家公司也不缺人,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。

“咱是农村人,享受不了那里。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。”他说,“农村家再破也是家。咱们自己慢慢整吧”。

这些事夫妇俩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起,他们不想给孩子们带来压力。

然而四胞胎的标签还是让孩子们感觉到负担。自打去海林林业局一中读书,换了新环境的4个孩子就把拒绝再穿同样的衣服。

“我上了大学,绝对不让人知道我是四胞胎。”性格耿直的王苑带着点儿情绪说道。

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,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,变成了现今的反感。

高一军训的时候,电视台又来拍他们。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,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。

高考之前,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,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,刚一到学校,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。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,让他讲两句。

事实上,这些年来,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”,持续关注这家人媒体已经寥寥无几。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,在消退的同时,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。

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粉制品直到18岁的那家企业,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。曾经对着镜头,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,在镜头之外,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。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,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。

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,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。人家抢白她:没有政策,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?

“咱就去问问,又不是管你要钱,这世上人拉扯一通!”

从那以后,孙艳梅和王华军打定主意:以后咱谁也不用,就凭咱自个儿,谁让咱自个儿养的。咱挣干的吃的干的,挣稀的吃稀的。

因为自己养了4个孩子,王华军从来跟别人比什么。只有一件事例外,就是孩子们的学校。

王华军上高中的时候,成绩不错,他参加过高考,只差5分没考上大学。他一直挺后悔,当时考上的高中同学,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错,“这个长,那个长的,出门开着小汽车,还有当律师的”。对比自己的境况,他后来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了。

四兄妹被海林林业局一中接收后,王华军担心农村孩子基础不行。他找木头钉了块小黑板,刷上黑漆,又在村大里装修房子固定的废物堆里,捡了一大盒彩色粉笔。

等孩子们放暑假回来,王华军自家的小课堂就开始了。

快没了。后来就去夫子庙,一个人30块钱。海底世界转一圈得七八百,也没去成。

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肯德基,也没进去吃,只是在门口拍了张照片。

上初中的时候,海林市林业局一中破格接纳了这个非林业系统家庭的4个孩子,不仅免去了所有的学杂费,每年还给贫困补助。

王华军觉得学校照顾太多,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。校长曾提出学校食堂让4个孩子免费吃饭,被他谢绝了。

“学校帮太多了,咱不能再那样,那不赖上人家了吗?”比较了附近“小饭桌”的价钱,他给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,让孩子们自己做饭,孙艳梅隔三差五过去看看。

外面的世界

孩子高考之前,在家顶多干点儿家务,老大扫地,老二擦炕,姐俩洗碗,是从小学开始的固定分工。王华军夫妇从没让他们干过农活儿。

然而对于种地的不易,孩子们并非一无所知。

老二王毅记得,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,赶上抢农时,爸妈早上3点多就出去割黄豆。那个时间天凉快,等太阳出来,天一热,黄豆就会炸开。

这个相貌挺好看的少年还隐约记得,有一年,因为下霜早,苞米都“绿棒子”了,爸爸只能把不成样子的苞米,以几毛钱的价格贱卖给酿酒的人。

王华军每个月给4个孩子各500元生活费。这这2000元的固定支出后来不得不慢慢加大,“这帮熊孩子,原来给500还有剩余,后来给500花500,给600花600”。

话虽这么说,他还是时不时打电话给住校的孩子,告诉他们: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。

为了筹钱,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场里打工。王华军打的工,当地俗称“放套子”,就是把林场采伐下来的木材,用牛拉爬犁的方式,从山上运到山下卡车可以通行的地方。林场会按照立方米数计算工钱。

“一(立方)米的木头有2000多斤”,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有几十块,工资随距离远近和木头的种类,也会有点儿浮动,但大体差不了多少。

不少年轻时跟他一起“放套子”的人,到了这个年纪都不干了:干活儿的地点都是在没有入烟的山沟里,方位感不强的人很容易迷路。

王华军虽然常常自嘲:爹妈都这样,孩子能精到哪儿去?也常常数落孩子们“完蛋”,“学习不好”。但只要孩子们想继续读书,他就继续供。

4个孩子都挺争气儿的。王富和王苑成绩稍微差一点儿,教过他们的老师说,那是因为基础太差,可孩子没放弃,一直认真地学。

“他们自己也知道咱这家庭,你爹就这么一个脑袋能赚多少钱。俺们也不比。俺们也这样事儿了,也尽力了。”孙艳梅说。

王毅和王婵在重点班,班主任去过他们租住的房子,发现只有两个女孩有桌子学习,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写作业,说已经习惯了。

兄妹四人几乎一直是各学各的。王富曾问过妹妹王婵一道数学题,小姑娘继承了爸爸的数学天赋,也继承了妈妈的直脾气,讲一次看哥哥没听懂,就没好气儿讲第二遍。打那以后,王富再没问过她题。

他们以“出生时间”没差几分钟为由,从不以兄妹相称,而是直呼其名。但王富还是很有“大哥”的责任感,高中3年,几乎都是他给弟弟妹妹们做饭。孙艳梅常说:俺家那几个,有啥啥活儿累活儿,都爱指挥使他干。

家务影响学习,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诉班主任:只要王毅和王苑能考好就行。

王华军在王毅身上倾注了最多期望,他觉得这孩子从长相、性格到头脑,都很像当年的自己。

王毅说,他是4个人当中唯一补过几天课的。中考前,因为他英语实在太差,爸爸掏了200块钱,请老师给他补了几节课。高考,中考时他的英语成绩,比平时涨了30多分。

但这次高考王毅没发挥出正常水平。这是王华军最大的遗憾。“人王苑前能学到半夜,他早早就睡了,你说气不气人?”沉默了一会儿,他叹了口气说,也怪咱做父母的,没法守着孩子学习。

“有时候我就寻思,你们既来到这样一个家庭,你好好争气行不行。就这个命,这家不行你別来呀。唉!”王华军红了眼眶。

他念叨,说啥也会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。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,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在南京的时候,主办方邀请每个家庭都在白马公园里种下一颗小树,并挂上铭牌,用锁头锁住。那把锁的钥匙,至今仍被王华军好好地保存着。

10年前,这个父亲曾在那里默默锁住自己的誓言:再苦,也要让孩子走出去。他希望将来有一天,4个孩子能够再到那棵树下看看,亲手把锁打开。



孙艳梅 王华军夫妇



赵凯摄

高考前四胞胎合影(从左至右:王富、王婵、王毅、王苑) 张克非摄